

妇女与大屠杀： 勇气和同情心

学习指南



由“大屠杀与联合国宣传方案”与纳粹浩劫基金会南加州大学
视觉历史和宣教研究所以及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 合作编制



联合国

“犹太妇女在大屠杀中表现出了真正的英雄行为。她们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动荡——传统遭到粉碎，配偶被送往死亡集中营，她们自身无法再去照顾亲人，被迫参加劳动，遭受各种侮辱和虐待。然而在危险和残暴面前，她们勇敢地加入抵抗队伍，把食物秘密送入犹太人区，并且付出令人痛苦的牺牲以保全孩子的性命。她们的勇气与同情心依然鼓舞着世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2011年1月27日

妇女与大屠杀：
勇气和同情心

学习指南

致 谢

感谢下列人士为本项目做出贡献：Na'ama Shik、Yehudit Inbar、Dorit Novak、Stephen D. Smith、Ita Gordon、Irenea Steinfeldt、Jonathan Clapsaddle、Liz Elsby、Sheryl Ochayon、Yael G. Weinstock、Inbal Eshed、Olga Yatskevich、Melanie Prud'homme、Amanda Kennedy Zolan、Allan Markman、Matias Delfino和Ziad Al-Kadri。

编辑：Kimberly Mann

© 联合国，2011年

历史照片经由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提供，版权归其所有。更多教育资源，请参见www.yadvashem.org。

参与方案的幸存者图像和证词经由纳粹浩劫基金会南加州大学视觉历史和宣教研究所提供，版权归其所有。关于纳粹浩劫基金会的更多信息，请登陆www.usc.edu/vhi。

目 录

	页次
前言（联合国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赤阪清隆）	5
导言	6
第一章：决心	9
第二章：领导力	12
第三章：同情心	15
第四章：奉献	18
第五章：勇气	21
第六章：毅力	24

附 件

大屠杀时间表	27
屠杀中心地图	30
幸存者的证词	31
延伸阅读	41

前 言

联合国新闻部与两所一流的学术机构，纳粹浩劫基金会南加州大学视觉历史和宣教研究所和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国际大屠杀研究学院合作，制作了关于妇女与大屠杀的学习指南及收录了幸存者证词的配套数字视盘(DVD)。这些教育材料旨在帮助高中生更好地了解，在这段充满动荡和恐怖的岁月里，纳粹及其帮凶使犹太族、罗姆族和辛提族妇女遭受悲惨的命运。

本学习指南的各章节将着重指出这些妇女的不同生活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往往是永久性的变化。面对歧视、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和随时可能死亡的前景，这些妇女下定决心，竭尽所能地满足家人的需要，保护她们的孩子。由于丈夫、儿子和父亲被逮捕，被驱逐出境，妇女的传统性别角色发生了变化，她们在犹太人区肩负起家庭和社区重担，而且往往决定着营地中的生存与死亡。妇女设立施食处，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团结一致，为寻求她们帮助的人提供支持。

她们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基本的教育，尽可能地遵守宗教传统。一度作为主妇和看护者的妇女不得不离家外出工作，适应最恶劣的环境，以求生存下去——甚至是在亲眼见到自己的孩子惨遭杀害的情况下。许多妇女鼓起勇气抵制纳粹政策，甚至有人加入了游击队。而且，尽管不断遭受侮辱、剥夺和暴力行径，许多妇女在大屠杀后继续重建她们的生活，证明了人类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她们自身，还为了那些照顾她们和需要她们照顾的人。

今天，联合国向这些勇敢的妇女们致敬。本组织正在努力确保全世界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受到保护，确保她们有能力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近期成立的妇女署——为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成立的新实体，体现了联合国的这一使命。

几个月前，新闻部启动了一项推特(Twitter)宣传活动，在该项活动中，我们询问参与者，如果安妮·弗兰克仍然在躲避纳粹的搜捕，他们希望向她传递哪些讯息？他们能否通过这种媒介联系到她？我们收到的许多消息都体现出安慰、勇气和希望，但最重要的还是团结一致。

安妮·弗兰克本人给出了最动人的表达，她写道：“这是个奇迹：我没有放弃我所有的理想，尽管它们看似那么荒唐和不切实际。而我始终坚持着，因为我仍然相信，无论如何，人心本善。”¹正是这种信念为联合国和抱着这种信念的人们赋予了生命力，而又是人们的牺牲、追求和努力塑造了这种信念。

赤阪清隆

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

注

1 安妮·弗兰克：《安妮日记》，M. Moyaart-Doubleday译（多伦多：Bantam出版社，1993年）。

导 言

在大屠杀期间，约有600万犹太人和无数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惨遭纳粹及其帮凶屠杀。从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苏联到1945年欧洲战场结束战斗为止，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力图屠杀它们管辖区内的每一名犹太人。纳粹分子认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低于“高贵”的德意志民族的劣等民族，在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他们着手征服，而后灭绝这些劣等民族。

杀戮从开枪射击开始，而后升级到动用毒气进行屠杀。由于随着1933年1月希特勒掌握政权纳粹开始实施犹太人歧视政策，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将1933年作为大屠杀时代的起始点。犹太人不是希特勒统治的唯一受害者，但他们是纳粹分子妄图赶尽杀绝的唯一群体。这次的种族灭绝运动导致欧洲三分之二的犹太人遭到了屠杀。

许多人由于政治、社会或种族原因成为纳粹统治的受害者。德国人是最早因为政治活动而遭到迫害的。许多人死在集中营内，但大部分人在精神崩溃后才被释放。身心不健全的德国人在“安乐死”方案中被杀害。其他德国人因为是同性恋、罪犯或不信奉国教而被投入监狱，这些人虽然受到了残忍的迫害，但从未像犹太人那样被列入要被彻底消灭的名单。

大批罗姆人和辛提人遭到纳粹分子的屠杀。估计受害者人数从20万到50万以上不等。纳粹对罗姆人和辛提人的政策变化不定。¹在德意志帝国，融入社会的罗姆人和辛提人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并最终被屠杀，而在苏联被占地区，融入社会的罗姆人和辛提人没有遭到迫害，但保留流浪生活方式的罗姆人和辛提人则被处死。



犹太人在波兰罗兹遭到围捕，两名妇女在遣送之前亲吻告别。

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和南斯拉夫的斯拉夫人也被纳粹分子视为劣等民族。因此，当希特勒试图根据种族重新组建欧洲的时候，他们受到歧视，被投入监狱，惨遭杀害。

本学习指南为了解妇女群体在大屠杀期间的遭遇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工具。各章揭示了妇女面临的特殊挑战，选择的应对方式，在被剥夺基本需要的情况下如何照顾家庭，在丧失所有希望的情况下如何竭力保持一定的使命感、人性和力量。配套的数字视盘(DVD)记录了这一时期六名女性通过不同方式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个人事迹。

研究妇女与大屠杀为何如此重要？通过研究我们会有何收获？如今，研究的视角更广阔、更深入，包括采用两性比较的视角，研究男女在大屠杀期间的身心经验和社会遭遇。

尽管体力不支，但妇女仍然被要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和压力，她们的生育能力和照顾孩子的能力受到了不利影响。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对她们的心理造成影响，失去家人，获救无望，被剥夺女性尊严和特质，最终导致她们抑郁不安。妇女还为孩子的命运感到焦虑，而且担心遭到性虐待和强奸。

在社会上，妇女继续力图营造一种类似家庭的氛围，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维护一些正常的生活状态。她们成群成群地被赶进犹太人区或被驱逐出境，往往被迫与男人分开，而且必须适应这种环境。尽管面临极端恶劣的处境，这些妇女仍然表现出了生存下去的决心、领导力、同情心、奉献精神、勇气和毅力。

注

- 1 大屠杀资料中心，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http://www.yad.vashem.org>。

讨论题

1. 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什么？
2. 哪些群体遭到纳粹分子的歧视、关押或屠杀？
3. 我们通过大屠杀期间的妇女研究了解到哪些方面？
4. 在当今世界里，我们应当如何打击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



1941年，一名抱着婴儿的妇女在波兰华沙的犹太人区乞讨。

第一章：决心

埃马努埃尔·林格尔布卢姆是一位记录华沙犹太人区生活状况的历史学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用适当的篇幅专门记述战争中的犹太妇女们。她们的勇气与坚定将在犹太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正是凭借她们的优点，数以千计的家庭战胜了那个时代的恐怖行为。”¹

换言之，记录大屠杀中的犹太妇女的历史应当留出重要的一页，描述她们在家庭单元内的英雄事迹。无论是正统的家庭还是世俗的家庭，不分富裕或贫穷，人口多或人口少，大屠杀对家庭日常生活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饥饿、恐怖、担心和纳粹分子的屠杀，犹太人家庭的传统角色发生了转变。不管是在犹太人区生活，还是在隐匿的地方、丛林、过渡营或其他地方生活，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犹太妇女，主要是母亲们不得不每天为了生存而挣扎。她们主要努力确保获得食物，谋到一份差事，让身体保持健康，避免生病，并且怀着坚定的信念，不顾一切地用尽所有办法，只要能让人活下去。这些变化推翻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妇女们开始承担起新的角色，被迫面对她们从未遇到过的极端恶劣的环境。

妇女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在波兰被占领土，男人们向东部逃亡，随时被征召从事强迫劳动——因此男人不敢上街。这些因素促使妇女扩大活动范围，提高她们在家庭的影响力。因此，妇女首当其冲，被迫应对各种艰难困苦。饥饿是一大问题。在犹太人区和藏身之处，那些还维持着家庭单位的犹太人，家庭成员忍受着极度饥饿。一些妇女和女童冒着生命危险偷运食物。母亲们被迫应对少得可怜的口粮配额，面临如何在家庭成员中分配食物的难题。许多母亲省下自己的口粮来尽力保护她们的孩子。由于被迫外出工作，往往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而时时刻刻面临搜捕的威胁，因此，妇女们忍受着巨大的焦虑。

犹太妇女和母亲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顽强地努力保持卫生，避免感染致命的疾病。即使自己重病在身，她们仍然会去保护和帮助患病的孩子。必要时，她们尽最大努力代表或维护自己的男人，有时会冒着极大的人身风险反抗纳粹分子。哈娜·阿布罗斯基（1932年生于波兰华沙）说：“在犹太人区，妈妈充分表现了她的足智多谋。战争前，我从未见妈妈下过厨房，也从未见过她亲自打扫卫生、洗衣刷碗，而那时她咬紧牙关，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让我们房间干干净净的。”²



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被选中从事强迫劳动后，妇女们再次遭到侮辱，被剃成光头。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大屠杀对于犹太人、罗姆人和辛提人的家庭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大部分人没有从围捕、入狱、流放和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妇女的适应能力、临时应变能力，以及她们的勇敢是大屠杀期间一种显著的现象。伊雷娜·利布曼（1925年生于波兰罗兹）在提交给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证词中写道：“我母亲从哪里获得了如此神奇的力量来应付这一切呢？一定是有某种隐蔽的、巨大的力量，一股爱的力量和坚定的毅力，让她坚持下去并一直守护着我们。”³

注

- 1 Emmanuel Ringelblum, 《华沙犹太人区笔记——Emmanuel Ringelblum日记》，Jacob Sloan编译，纽约：Schocken出版社简装本，1974年）。
- 2 Hana Abrotsky, 《十字之星》，（特拉维夫，1995年）第96-97页[希伯来语]。
- 3 Irena Liebman的证词，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档案，O. 3/3752。

讨 论 题

1. 在艰难的日常生活中，妇女们为了生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2. 在犹太人区，母亲们如何帮助她们的家庭生存下去？
3. 在大屠杀期间，妇女的传统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
4. 妇女们为何能有力量应对如此艰难的处境？



犹太妇女和女童正在法国的一处集中营洗衣服。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第二章：领导力

幸福是点燃自己，照亮他人。
幸福是在内心深处熊熊燃烧的一团烈火。
幸福是为了光荣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一股力量。
幸福是点燃自己，照亮他人。

——汉娜·泽尼斯

这首诗的作者是汉娜·泽尼斯，23岁，匈牙利犹太人，是伞兵队的一名成员，从巴勒斯坦出发奔赴被纳粹占领的欧洲执行营救任务。尽管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但她觉得伞兵队会鼓舞人心，提振士气，成为欧洲犹太人希望的象征。汉娜在1944年越境进入匈牙利时被纳粹逮捕，遭到酷刑，随后被行刑队处死。

汉娜是许多承担起传统上属于男性领导角色的妇女中的一员。这些妇女鼓舞了她们所在的社区，在最需要的时候为人们带来了力量和希望。她们领导社区和社会团体，设立施食处和日间托儿所，她们接济生活困难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塞西莉亚·斯列帕克是一名记者兼翻译，战前生活在华沙。“Oneg Shabbat”档案的创办者埃马努埃尔·林格尔布卢姆委托斯列帕克对生活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犹太妇女进行研究。斯列帕克在1942年的春冬两季开展了采访，以独特的方式描述了妇女为了应对更大的危险和不断变化的住宿方式所采取的策略、挑战和反抗。

尽管极少数的妇女能够加入犹太人区的决策者行列，但吉西·弗莱希曼成为了以男性为主的斯洛伐克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成员。犹太居民委员会是纳粹为了确保他们的命令和法规得以实施而在犹太人区设立的犹太人理事会。大屠杀历史学家耶胡达·鲍尔认为，吉西在斯洛伐克犹太居民委员会中领导了一个地下团体，努力使更多的犹太人逃离斯洛伐克。鲍尔教授在他的《反思大屠杀》一书中谈到，有文献记录表明，正是由于她具备了女性的优良品质、坚强的个性、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男人们才接受她的领导。¹

另一位加入犹太居民委员会的女性是罗莎·绍鲍德-加布罗斯卡博士。她是一名内科医生，刚到犹太人区就加入了维尔纽斯犹太居民委员会。在担任委员期间，她协调幼儿的照顾工作，在她的倡议下，成立了一所日间托儿所，孩子们在这里有东西吃，得到医疗援助，还有人陪着玩耍，直到他们的父母下班回来。绍鲍德-加布罗斯卡博士还开办了一所为幼儿分发牛奶的专门中心和一家孤儿中心。绍鲍德-加布罗斯卡博士在马伊达内克被害，那是纳粹在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设立的一个集中死亡营。



拉黑尔·鲁德尼茨基加入了在立陶宛Rudniki森林活动的一支游击队。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妇女还尽可能领导组织文化活动，振奋人心，培养社区意识。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非常需要展现一些正常生活的迹象，如艺术、音乐和戏剧演出，缓解人们持久存在的焦虑和绝望之情。Vava Schoenova (纳瓦·沙恩) 在战前是布拉格著名的戏剧演员。1942年7月，她被遣送到特雷辛犹太人区，在那里，她继续为儿童和青年人演出、指导和创作戏剧。多年以后，特雷辛的一名女性幸存者告诉沙恩：“我的童年是您给我的。……那时我是你的‘萤火虫’，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在舞台上跑来跑去，唱着‘春天一定会来到’。对我来说，它的意义超乎您的想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您为孩子们创造了美好的时光。”²

注

- 1 Yehuda Bauer, 《反思大屠杀》(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1年)。
- 2 Nava Schaan, 《做一名演员》, Michelle Fram Cohen译(马里兰州拉纳姆: Hamilton图书社, 2010年)。

讨 论 题

1. 汉娜·泽尼斯为什么被视为她那个时代的领袖?
2. 为什么塞西莉亚·斯列帕克对华沙犹太人区妇女的采访在今天看来如此重要?
3. 妇女加入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意义是什么?
4. 妇女通过哪些其他方式担任了社区领导者?



伊丽莎白·黑德维希·莱亚因在战争期间营救犹太儿童而被追授“国际义人”称号。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第三章：同情心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密西拿之公会篇4:5）

在大屠杀期间，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多是漠不关心或充满敌意。许多人坐视过去的邻居被围捕和杀害，有些人与杀戮者合谋，还有许多人从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中获益。然而，在一个道德完全沦丧的世界里，有一小部分人鼓起异乎寻常的同情心，捍卫人类的价值观。这些人就是国际义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

国际义人是由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代表以色列国和犹太人授予在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一种正式称号。在最高法院法官的领导下，一个特别委员会根据一套定义明确的标准和条例授予“国际义人”称号。

为营救行动付出的代价各不相同，轻则被送进集中营，重则被处死。纳粹到处张贴警告人们不要帮助犹太人的告示。许多决定收留犹太人的人都不得不牺牲自己正常的生活，而开始秘密生存——因为惧怕他们的邻居和朋友告发——生活笼罩在被告发和逮捕的恐惧之中。

大部分营救者都是普通人。有些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其他人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是出于对周围人的关心的普通人。许多时候，他们从未打算成为营救者，在做出这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时往往毫无准备。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而正是他们的仁慈感动了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伊丽莎白·黑德维希·莱亚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爱德华和多拉·格斯勒是一对犹太夫妇，他们和孩子一起生活在波兰南部城市别尔斯克-比亚瓦。1938年，具有日耳曼族血统的波兰天主教徒伊丽莎白·黑德维希·莱亚加入这个家庭，给他们的三个孩子——11岁的埃莱克、4岁的莉莉和1岁的罗曼当保姆。战争爆发时，伊丽莎白没有回到安全的家中，而是选择继续与格斯勒一家生活在一起，并帮助他们从别尔斯克-比亚瓦逃到里沃夫。在里沃夫，多拉因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伊丽莎白继续留下来帮助丧妻的爱德华抚养三个孩子。1941年底，爱德华和他的儿子埃莱克逃往匈牙利，莉莉和罗曼仍由伊丽莎白照顾。几个月后，在1942年3月，为保全性命，伊丽莎白、莉莉和罗曼逃离里沃夫，经喀尔巴阡山脉前往匈牙利寻找爱德华和埃莱克。伊丽莎白将她的贵重物品缝在小罗曼外套的内衬里，雇了一辆破旧的小车和两名向导，带他们穿越山区。夜幕降临，一行人被盖世太保拦住。伊丽莎白凭借她流利的德语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战争结束后，伯根-贝尔森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流离失所者营地，1946年有1万人居住在这里。

成功地使盖世太保们相信，她着急为生病的孩子寻找医生。为保护孩子，伊丽莎白竭尽全力，不顾自身安危，甚至将莉莉的头发染成浅色，并教他们基督教的习俗。

最后，他们在布达佩斯与爱德华和埃莱克团聚。1944年，伊丽莎白和爱德华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一家人再次分离，最后，他们一家设法逃到了罗马尼亚。

2007年10月11日，伊丽莎白·黑德维西·莱亚·格斯勒被追授“国际义人”的称号。

讨 论 题

1. 谁是“国际义人”？
2. 在面临被处死的情况下，是什么促使人们营救他们的邻居，甚至素不相识的人呢？
3. 你认为，为什么更多的人没有试图帮助那些遭受纳粹迫害的人？
4. 伊丽莎白·黑德维西·莱亚的故事为何如此独特？



1944年，Yulichka Stern
和她的儿子在奥斯维辛
比克瑙双双遇害身亡。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第四章：奉献

妇女的身份是照顾他人，这种身份的来源在于，人们认为妇女有责任照顾家庭和其他人。因此，在大屠杀期间，妇女成为可依靠的照顾者，竭力帮助家人和朋友活下去。

在大屠杀以前，妇女已经承担起一些职责。她们养家糊口，有时甚至成为唯一的经济支柱。她们担任了一些需要经过学术训练的职责，如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和大学讲师等。但大部分职业女性都是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店主、儿童护理员、厨师、裁缝等。很少有妇女掌握经济大权，而且确定没有女性担任欧洲犹太人领袖。

这种行为模式在大屠杀期间仍然持续；甚至可以说扩大了范围。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必须工作，或者为了养家糊口，或者是在纳粹的胁迫下在德国工厂工作。在犹太人区生活阶段，妇女接受她们所遇到的各种工作，但许多人都找到了一份与帮助和照顾他人有关的公共职务。

有些人在大屠杀之前也从事过此类工作，但许多其他人则是利用当家庭主妇时掌握的技能，并在社区活动中使用这些技能。妇女们设立施食处，开办儿童之家，并建立照顾老人的网络。她们为那些父母被流放或被动员参加强迫劳动的孩子担任教师和看护者。妇女们照顾已无力照顾自己和家庭的其他妇女。她们在犹太人区、游击队和营地里充当医生和护士。

家庭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尚有一线希望时给自己，尤其是孩子，找到藏身之所。为孩子安排藏身之所是一个复杂、昂贵而且较为不寻常的过程。父母很清楚，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所以内心不愿走这一步，除非他们感到除此之外，只有死路一条。由于很难说服自己，所以许多父母即使可以把孩子交给他人照看，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一些犹太父母在战前就已认识到希特勒造成的危险即将到来，所以通过“慈善大转移”行动将孩子送往英国。在那里1万多名犹太儿童安全地在英国家庭里生活。

在暴力恐怖肆虐之际，妇女们秉持刚毅坚卓的精神，继续关爱她们的孩子，照顾他们，直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刻为止；她们还为孩子做出决定命运的决定，那是过去的人们从未遇到过的命运。有些母亲选择与孩子一起死去，尽管她们可以做出其他选择。拉比伊斯拉埃尔·梅耶尔·劳是在即将和母亲一起登上火车的前一刻被母亲推给别人的。他写道：“离开母亲，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事；那种痛苦时时刻刻充斥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母亲把我推给纳夫塔利[他的哥哥]，是救了我的命。”¹



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儿童准备起航前往英国哈里奇。

在某些时候，一些人失去了家人，能从照顾他人中得到一些安慰。她们冒着生命和健康危险，在藏身地治疗身患传染病的病人和儿童。许多人与孩子一同死去，尽管她们有机会得救。随着局势日益恶化，她们日夜操劳，不允许虚弱的身体减少她们的努力。斯特凡妮娅·维尔钦斯卡是阿努什·科尔恰克医生的助手。她们共同开办了华沙犹太孤儿院。在写给巴勒斯坦朋友的一封信中，她写道：“亲爱的，我们很好。我在孤儿院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大部分工作都是科尔恰克干的。我没有过来，是因为我不想丢下孩子们自己离开。”²维尔钦斯卡和科尔恰克可以选择不和孩子们一起被流放，但他们拒绝了，与孩子们一同走进了毒气室。

注

- 1 Rabbi Israel Meir Lau, 《别对孩子扬起你的手》（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 Miskal-Yedioth, 2005年）。
- 2 Yehudit Inbar, 《亮点：大屠杀中的妇女》（耶路撒冷：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出版物，2007年）。

讨 论 题

1. 大屠杀前人们认为妇女应该做什么？
2. 在犹太人区，为什么有些妇女能够帮助其他人？
3. 妇女们面临哪些与孩子有关的难题？
4. 为什么有些妇女会照顾别人的孩子？



罗扎·罗博陶英勇地偷运火药，用于炸毁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第四号焚化厂，从而拯救了生命。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第五章：勇气

在大屠杀期间，犹太族、罗姆族以及辛提族妇女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她们被迫离开家园，挤进犹太人区，随身只带很少的物品。在那里她们不断面临被逮捕和流放的危险，还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侮辱和虐待，她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纳粹暴徒，并想办法活下去。

这些妇女当中，有些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他人，偷运食物，充当信使，反抗纳粹的法律、政策或意识形态。这些活动常常危及参与者的生命，而参与这些活动的有非犹太人，也有犹太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些人隐姓埋名获取伪造的身份证明，帮助其他犹太人逃跑，另外一些人用各种可能的形式参与精神反抗——写日记，奉行犹太人的信仰，教育年轻人，以及传递可能事关生死的重大信息。

在纳粹统治下，妇女有时会受益于纳粹意识形态中的陈规定型观念，这些观念认为，妇女只会养育孩子、照顾家庭和信奉宗教。被动的、受制于丈夫的家庭主妇形象在纳粹的心中根深蒂固，有时使得纳粹不会立刻怀疑妇女从事不符合这种形象的“颠覆性”活动。而且，犹太妇女往往同非犹太人的邻居有更多的接触，因此更熟悉基督教的习俗，为她们冒充假身份带来便利。出于这些及其他原因，妇女在精神和实质上都可以采用异于男人的方式，反抗纳粹。

妇女在各种反抗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青年运动的妇女尤其如此。在波兰，妇女充当信使，向犹太人区传递消息。埃马努埃尔·林格尔布卢姆在1942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英雄的女孩Chajke和Frumke——她们是值得大作家著书立传的人。她们勇敢地往返于波兰的各个城镇之间。[……]她们每天都面临生命危险。[……]她们接受并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毫无怨言，毫不犹豫。[……]她们自觉自愿，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没有什么能阻挡她们，也没有什么能震慑她们。[……]她们多少次直面死亡？多少次被捕搜身？[……]在当前这场犹太人的战争史上，犹太妇女将写下光辉的一页。”¹

许多妇女逃到了波兰东部的森林和苏联，在武装游击队里当兵。妇女甚至在法国（和法国犹太人）的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妇女是犹太人区反抗组织的领导人或成员，另一些人参与集中营内的反抗活动。在奥斯维辛一号营地，五名部署在维斯瓦河联合钢铁厂分遣队的犹太妇女——阿拉·格特纳、雷吉娜·扎佩尔施泰因（又名Safir）、埃斯特·瓦伊布鲁姆、罗扎·罗博陶以及一名无名妇女，可能叫费耶格·塞加尔——在1944年10月的起义中为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犹太特遣队提供了破坏毒气室的炸药，炸死了



波兰弗沃茨瓦维克犹太人区的犹太妇女佩戴着自制的大卫之星徽章。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几名监狱看守。Noah Zebludowicz是奥斯维辛犹太人地下组织的成员，他在回忆录中对罗扎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他回忆她在被捕后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她说，她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也不为自己将要死去而感到遗憾。她交给他与同志们分享的字条上写着这样一句鼓励的话：hazak ve-amatz（要坚强，要勇敢）。²

一些妇女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讲述了关于英雄主义、决心与勇气的动人故事。但大部分妇女都被纳粹杀害了。她们的反抗事迹成为她们留给我们的遗产。

注

- 1 Emmanuel Ringelblum, 《华沙犹太人区笔记——Emmanuel Ringelblum日记》，Jacob Sloan编译，（纽约：Schocken出版社简装本，1974年）。
- 2 Gutman, I. 编著，《人与灰烬：奥斯维辛比克瑙之书，Noah Zebludowicz回忆录》（Merhavia: 1957年）[希伯来语]。

讨 论 题

1. 本章描述了哪些形式的反抗？
2. 为什么妇女在某种意义上更容易加入反抗？
3. 妇女为什么会选择加入打击纳粹分子的战斗组织？
4. 什么是精神反抗？



妇女在德国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从事强迫劳动。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第六章：毅力

许多妇女受环境影响并凭借毅力，在这场大屠杀中，得以幸免于难并且重新开始生活。大多数幸存者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家人、房屋、社区、财产、工作、语言和文化。年轻人不仅失去了童年、教育和希望，还失去了对他人和整个世界的信任。沉浸在悲伤痛苦中似乎比再次凭借毅力继续生活更容易，但许多幸存者选择这样去做。她们通常会在新的国度组建新的家庭，从事新的职业，学会去爱，去感受快乐。

亚法·哈特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她在战争中失去了整个家庭，她在称颂大屠杀幸存者时写道：“[……]我觉得，如果能重新成为一个有价值观的人，那是更大的胜利[……]。我们这些大屠杀幸存者是值得人们称赞的。因为[考虑到]我们曾经遭受的一切苦难，我们来自哪个地方和我们所目睹的一切，而我们一直在努力开创新的一代，继续生活并做出贡献[……]。因为，我们有实力去证明我们没有被击垮；我们也有能力在废墟上重建生活。”¹

大屠杀中的一些女性幸存者后来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著名的艺术家、作家、演员、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波兰裔犹太人纳塔利娅·卡普(née Weissman)就是一个例证。她在18岁那年随柏林爱乐乐团首次登台。战争期间，她被送往Kraków-Plaszów集中营，凭借音乐天赋，为集中营的指挥官演奏乐曲，从而逃过一劫，后来又在奥斯威辛幸免于难。战争结束后，她随同克拉科夫爱乐乐团演出。她回忆当时她想向纳粹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打垮。²她90岁高龄时，还在参加演出，经常在钢琴上放一块粉色手帕，以展示女性的雍容华贵和温柔娴淑，而那正是她在集中营时的梦想。

盖尔达·魏斯曼·克莱因是大屠杀幸存者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在捱过了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和苦役之后，她被纳粹逼迫加入350英里的死亡长征，同行者中还有其他体弱多病的囚徒。后来，她与丈夫共同成立了Gerda与Kurt Klein基金会，通过教育和社区服务促进容忍、尊重和增强学生的能力。2006年，魏斯曼·克莱因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首次纪念活动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³2010年，白宫授予魏斯曼·克莱因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

西蒙娜·韦伊女士是法国的一名律师、政治家，17岁时被纳粹遣送到奥斯威辛，后来又到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韦伊最后成为一名最受法国人民爱戴的政治人物，因其政治气魄和个人勇气



一群妇女在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后领取面包，1945年4月。

而备受赞赏。她在法国政府担任过多项职务，其中包括卫生部长，并被任命为欧洲议会第一任主席。她是获得声名显赫的法兰西学术院认可的少数几名女性之一。2007年，韦伊女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年度纪念活动上发表了主旨发言。³

上文讲述了三名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她们后来成为了母亲、妻子和祖母。通过不同的方式，她们挣脱行凶者造就的命运的摆布，冲破绝望并继续生活。

注

- 1 Yafa Hart女士的证词，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档案-O. 3/8873。
- 2 “讣告：Natalia Karp”，《每日电讯报》，2007年7月11日。
- 3 登陆www.un.org/holocaustremembrance查阅证词。

讨 论 题

1. 是什么激励大屠杀幸存者重新开始生活？
2.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会面临重重困难？
3. 粉色手帕对钢琴家纳塔利娅·卡普意味着什么？
4. 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对盖尔达·魏斯曼·克莱因和西蒙娜·韦伊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妇女幸存者在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后领取新衣服，德国，1945年4月。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附 件

大屠杀时间表

1933年1月30日	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
1933年4月1日	抵制犹太人在德国开办的企业
1933年4月7日	犹太人被逐出德国公务员队伍
1934年8月2日	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总理希特勒接任总统职权
1934年8月19日	德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公民投票，确定了希特勒作为绝对领导人的地位(Führer)
1935年9月15日	德国颁布《纽伦堡种族法》，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1938年7月6日至15日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有关犹太人难民问题的会议
1938年8月17日	被德国纳粹认定为犹太人的所有人必须携带标有“J”表示犹太人身份的证明(Jude)
1938年11月9日	Kristallnacht ，一般被称为“水晶之夜”，在德国全面掀起针对犹太人及其房屋、企业和犹太教堂的暴力行为
1938年11月15日	犹太儿童被逐出德国学校
1939年9月1日	德国侵占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10月	希特勒授权大范围屠杀德国各机构中身心不健全的人
1940年5月20日	建成奥斯威辛一号*营地（被德国占领的波兰）
1940年10月12日	下令（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将华沙的犹太人押往犹太人区
1941年6月22日	随着德国入侵前苏联，形成了由德国党卫军和警察组成的屠杀小分队
1941年7月8日	流动屠杀小分队开始在明斯克（前苏联领土，今属白俄罗斯）进行屠杀
1941年9月15日	德国采用黄色徽章辨识犹太人
1941年9月29日至30日	上万名犹太人在乌克兰基辅市郊的巴比雅峡谷被害
1941年10月8日	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建成奥斯威辛二号（比克瑙）*营地
1941年10月	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建成卢布林/马伊达内克营地

1941年10月15日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犹太人从“大德意志帝国”遣送到犹太人区，和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和前苏联建成的劳动营和灭绝营
1941年10月28日	流动屠杀分队在考纳斯（被德国占领的立陶宛）屠杀上千名犹太人
1941年12月8日	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建成第一个灭绝营——切姆诺
1942年1月16日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犹太人从被德国占领的波兰罗兹犹太人区遣送到切姆诺
1942年1月20日	柏林万湖会议，协调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或灭绝欧洲犹太人
1942年3月15日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犹太人从乌克兰Lwów（利沃夫）犹太人区遣送到被德国占领的波兰贝乌热茨灭绝营
1942年3月27日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被德国占领的法国犹太人遣送到灭绝营
1942年5月31日	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建成奥斯威辛三号*营地
1942年7月15日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犹太人从被德国占领的荷兰遣送到灭绝营
1942年7月22日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犹太人从华沙犹太人区遣送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1942年12月16日	德国警察当局下令大规模围捕所谓“大德意志帝国”的罗姆人和辛提人，并将他们遣送到奥斯威辛比克瑙营地*
1943年3月15日	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犹太人从被德国占领的希腊遣送到灭绝营
1943年4月19日	华沙犹太人区爆发起义
1943年6月21日	开始清除苏联被占领土上残留的犹太人区
1943年9月15日	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出被德国占领的意大利
1944年5月15日	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犹太人驱逐出被德国占领的匈牙利
1945年1月27日	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5年5月7日至9日	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10月24日	《联合国宪章》生效
1945年11月20日	开始在纽伦堡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
1948年12月9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260 III A号决议）
1948年12月10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2002年7月1日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生效
2004年7月12日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首位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
2005年11月1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题为“纪念大屠杀”的第60/7号决议
2006年5月3日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咨询委员会
2007年1月26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题为“否认大屠杀”的第61/255号决议
2007年5月27日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新一任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

* 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指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1940-1945年）。2007年6月，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在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上更改集中营的名称。

屠杀中心地图



©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幸存者的证词

配套数字视盘(DVD)记录的大屠杀幸存者



尤利娅·伦蒂尼(née Bäcker)于1926年4月15日生于德国艾森，父母是路德维希和约翰娜·贝克。尤利娅的父亲是一个马贩子，会编篮子，同时还是个心灵手巧的木工，自己动手制作了家庭旅行篷车。尤利娅生活在一个由罗姆人和辛提人组建的家庭中，她的童年很幸福，充满了亲情。尤利娅在家说罗姆语，和朋友则说德语。

一家人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仍然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贝克一家迁居到德国比登科普夫之后，尤利娅和姐妹们在编织厂和当地农场工作。

1943年3月8日，贝克一家被赶出家园并被押上开往波兰奥兹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火车，在路上的这三天，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等待被收入集中营的漫长时间里，尤利娅记得除了母亲哀求让一家人呆在一起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言不发。



尤利娅·伦蒂尼与家人摄于战争爆发前。

在集中营里，尤利娅和她的三个姐妹被分到厨房工作。她在那里染上伤寒，后来被转入伤病区。六个月之内，尤利娅的父母和姐姐玛蒂尔德相继死于疾病和饥饿。大约在同一时期，她的哥哥威廉被带走，从此杳无音讯。1944年初，尤利娅孤身一人被转入德国施利本集中营，她在那里再次被分到厨房工作。有一次，因为被抓住偷吃食物，她在所有囚犯面前遭到了严厉惩罚。

1945年苏联军队解放施利本之后，尤利娅回到了比登科普夫，她的母亲曾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回到那里。她找到了几个兄妹，虽然房子还在，但所有财产都被洗劫一空。

尤利娅在比登科普夫遇到了美国士兵亨利·伦蒂尼。八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尽管两人之间存在语言障碍。1946年，尤利娅和亨利来到美国，并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他们有了两个女儿辛西娅和罗莎，后来有个三个孙子和三个曾孙。

证 词

尤利娅·伦蒂尼

我们不知道，我们乞求，但是我们没有大吵大闹，因为我爸爸说：“要是非得那么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顺着铁路朝前走，走到了车站，看见了一个客车车厢。可车厢是空的。这是给我们准备的。我们都进了车厢。妈妈有些沮丧，也有些紧张，她怀里抱着

孩子，孩子都很小。爸爸说：“别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但他们哪里知道集中营的厉害呀！他们对“强迫劳动营”有所了解。[请解释一下。]他们把不想工作的人关在那里，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就那么做了。这些人欠政府的儿童抚养费，不出钱养孩子。他们称之为“强迫劳动营”，让人们在营里呆半年到一年。我们当时就知道那么多，而奥斯威辛在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他们对这个什么也不说。你看我父母多落伍呀！[那儿的纳粹士兵是从外地调来的吗？你认识他们吗？]他们都不是比登科普夫这个小镇的，而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比登科普夫只不过是个死气沉沉的小镇而已。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被轰炸过，没有什么大工厂，只有一些家庭作坊做一些小东西。所以一点儿都没被轰炸过。不管怎么说，我们坐在那一节车厢里到了法兰克福……[有多远？]法兰克福离我老家110公里。在旅途中我们换了不少次车，可毕竟到法兰克福了，我们是傍晚的时候到的。一个纳粹上了车，说：“把你们的小物件儿都收拾好，我们得在这儿下车了。明天早晨你们可以找人说说。”爸爸说：“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能在这儿跟人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纳粹说：“我只能说这么多。下车了，我们得把你们带到那边去。”在那里，他们把所有个人物品、犹太人、吉普赛人集中到一起。当时我们不懂是怎么回事，可情况就是那样。当然，我们得下车，走进大厅，那里有些隔间，挤满了人。我爸爸从犹太人那里打听到了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去奥斯威辛。他听说过奥斯威辛，说道：“不，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不，我们得走，明天早晨我要去见车长，他们要把我们从这儿弄到……。”车长一直都没来。第二天早晨，大火车来了，车厢里装满了人。他们接的人都在那儿了。妈妈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说：“把手拉紧，别分开，把手拉紧，别分开，把小家伙们抱好，咱们走在一起，那样就不会走丢了。进那节车厢。”他们塞的人太多了。没法上厕所，什么都没有，他们在角落里放了些稻草，只能在那儿解决了。我们在车厢里闷了三天，一直没有出来。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们偶尔停一下，估计是在大城市，换到另一辆火车，我们换了一次又一次，最后，整列火车装满了囚犯：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政治人物，各色人等坐满了各个车厢。

“他们打开车门，门吱嘎作响……透进来一丁点空气……我们到达奥斯威辛的时候，整个身体都麻木了：全身的骨头、腿，哪都动不了。有两个身穿条形制服的人，他们听见我们说拉地诺语，就用拉地诺语跟我们说‘我们是从萨洛尼卡来的希腊人。把孩子交给老人，’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你哪会知道‘把孩子交给老人’是什么意思？他们害怕跟我们说话，只是在说，‘把孩子交给老人。’”

劳拉·瓦龙的证词，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档案O. 3/10423，耶路撒冷：1996年，第19页



弗拉德卡·梅德(née Peltel)出生在波兰华沙。弗拉德卡和她的姐姐哈尼娅及哥哥哈伊姆成长在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什洛莫·佩尔特尔经营一家日用杂品店，母亲汉娜是名家庭主妇。弗拉德卡上了职业学校，在那里学习缝纫。

一家人被遣送到华沙犹太人区，她的父亲不久后死于肺炎。她的姐姐在犹太人区的一个公共厨房里工作，她的哥哥从事分配给其他犹太区居民的强迫劳动，弗拉德卡在一家小型合作商店当收银员。她后来成为犹太人区青年自助组织的积极分子，加入了非法社会民主青年组织“未来(Zukunft)”。

1941年，弗拉德卡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被遣送到特雷布林卡死亡营。第二年，弗拉德卡加入了“犹太人战斗组织”(Z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她负责为犹太人区的战士购买武器。在为“犹太人战斗组织”工作期间，她结识了她的丈夫本杰明·梅德。

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之前，弗拉德卡得到了一张伪造身份证明，于是就能作为非犹太人通过关卡，起义时，她跑出犹太人区，帮助一些犹太战士从犹太人区的下水道逃出，之后又穿梭于波兰各游击队兵营，为游击队员供应物资并传递消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弗拉德卡和本杰明回到华沙，发现那里已满目疮痍。他们到罗兹寻找尚在人世的家人。两人在罗兹结婚，1949年移民到美国。在战后的岁月里，弗拉德卡和本杰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回忆大屠杀的经历上。弗拉德卡开始撰写文章，描写战争期间的生活动，后来改编成自传小说。梅德一家育有两个孩子和五个孙子。



©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本杰明·梅德(Miedzyrzeczki)
敬赠

弗拉德卡·梅德在华沙担任犹太人地下信使时使用的伪造身份证明。

证 词

弗拉德卡·梅德

我参加了非法青年组织——名叫“未来”的社会民主青年组织。我们作为非法团体聚在一起，举办各种讲座，有时候听音乐，搞讨论会。这只是些小团体，在一起读非法文学作品。我不过是跟他们混在一起。我妈妈对我们干这种事多少有些不安，因为要是被发现了，就会被处死。当时犹太人区没有学校，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开始在所谓的“儿童之角”教孩子们学习。那时候孩子们没学可上，学校关门了。我们把他们聚拢起来，教他们唱歌、写字，多少让他们有些事情做吧。在犹太人区组建了各种委员会，帮助解决饥饿问题。在华沙犹太人区，犹太人组建了2 000多个住户委员会，称为自助会。非法的犹太人文化组织问世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搞讨论会。后来不顾宵禁，派人去各个封闭起来的地方向人们宣讲。我当时十六、七岁，去听了讲座。我记得是在帕拉贾30号，我讲的是佩雷斯，还有邦切克·茨威格。两个年轻人在门外放风，窗户也遮起来，德国人一来马上敲出响声，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散开。我当时留宿在一所公寓。很难说讲座讲的怎

么样，他们都讲了什么。但我还记得当时的气氛是很热烈的。在犹太人区饥饿现象很严重，伤寒病开始流行，还有饥饿和痛苦。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一位年轻姑娘在讲课，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让人们知道这一切都将过去，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希望一直弥漫在犹太人区。



埃丝特·贝姆(née Svabenic)于193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奥西耶克的一个富裕的犹太教家庭。两年后，一家人搬到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埃丝特在那里进入一所犹太学校学习，直至1941年4月德国人攻克克罗地亚。

之后，克罗地亚政府归纳粹统治，由于政府官员搬进他们的房子，一家只好离开那里。埃丝特的两个姊妹耶尔卡和薇拉后来都加入了游击队。耶尔卡被德国人抓住并处以绞刑，薇拉则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埃丝特和父母逃到了克罗地亚被意大利占领的区域，后来又到了意大利，作为战争中的平民囚犯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了两年。

村庄里生活了两年。

1943年9月，在得知德国人正逼近村庄搜寻犹太人后，一家人再次被迫逃亡。他们逃到了山区，在许多地方与意大利农民为邻，直至1944年2月。在那段时间里，埃丝特隐姓埋名，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童年就这么度过了。她无法与同龄人接触，食不果腹，一直害怕被德国人抓住。但是，她从未忘记过救命恩人的善意和正直。



埃丝特·贝姆与父母在意大利。

1945年4月，埃丝特和父母重获自由，他们搬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并在那里得知薇拉尚在人世。一家人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重逢。埃丝特在1950年迁居以色列，与米尔科·贝姆在1952年结婚。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在1954年和1962年出生。1966年，全家搬到了加拿大，三个孙子在那里出生。米尔科于1975年逝世，埃丝特在1978年再婚。

证 词

埃丝特·贝姆

我们[她和她的父母]离开了。我们开始爬山。那个村子后面就是山。那是一个美丽如画的村子。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爬得很高，只是在山的外围转悠。我们爬呀，爬呀。我们看见了几栋小棚屋，破破烂烂的，里面却住着人。我们在半夜敲了敲一个屋门。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家里有三个男孩。三个孩子从大到小分别叫老大、老二、老三。这就是他们的名字。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走投无路了。信不信由他们。我们说：“看，我们是落难了，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得躲起来。德国人在追我们，让我们进去吧。”他们让我们进了屋。他们腾了一间干净些的房间，或者说他们把一个房间打扫了一下，给了我们一张床，留我们待了几天。我希望没有经过大屠杀的后来人知道那个时候不是啥都不好，也有体面和善良。我认为，就我的情况来说，我得感谢这些人，不仅要感谢所有意大利人，还要感谢那些不求回报的人们。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安全，甚至是家庭的未来，因为一旦事情败露，他们就会被处死。而当时是纳粹机器——死亡机器运转最好的时候。这台机器润滑得很好。而他们却选择救我们，庇护我们，给我们饭吃，可他们自己都一无所有。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利他主义者。



阿格尼丝·库恩 (née Diamantstein) 于1926年5月3日出生于罗马尼亚萨图马雷。她的父亲Dezső 迪亚曼特施泰因是名会计兼粮食出口商，母亲埃特尔·迪亚曼特施泰因 (出生时名为埃特尔·科恩) 是个家庭妇女。她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几种语言。除了母语匈牙利语外，阿格尼丝学会了说英语、法语、德语和罗马尼亚语。她与其他犹太伙伴一起，在一所天主教小学上学。作为家中的独女，她过着优越的生活。

1940年8月，匈牙利在吞并北部特兰西瓦尼亚之后（其中包括阿格尼丝的家乡），颁布了反犹太人法律。阿格尼丝被禁止在天主教学校上学，不过她还可以在公立高中继续学习。在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生活条件很快变得更加恶劣，1944年5月初，阿格尼丝和她的父母被迫进入萨图马雷犹太人区。

1944年6月3日，就在诺曼底登陆日的三天前，阿格尼丝及其父母被遣送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到达营地后，阿格尼丝就与父母隔离。她的母亲立刻被送进了毒气室，她的父亲设法活了下来，但不多久便在解放前去世了。阿格尼丝被她的堂姐安娜·科皮希救下，她是个医生，当时担任营地医院的囚犯医生。在堂姐的监督下，阿格尼丝被安排担任医务助理。1944年11月，她被转到德国的布伦瑞克集中营，不久之后又到了萨尔茨韦德尔集中营。在那里，她被强迫在军工厂劳动。1945年4月，美国军队解放了萨尔茨韦德尔，阿格尼丝重获自由。



阿格尼丝·库恩高中时的相片，1944年5月1日。

解放后，阿格尼丝仍然留在萨尔茨韦德尔流离失所者营地，之后返回家乡上大学，并在那里与堂兄妹生活在一起。她还在那遇见她的丈夫安德鲁·库恩。他们试图移居罗马尼亚，但是由于共产党规定的移民政策，他们未能获得批准。1962年，他们和两个女儿安妮和玛丽安娜移民美国并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定居。

证 词

阿格尼丝·库恩

我当时在一个猩红热病房工作。这种流行病很轻、很轻，病人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他们一开始有些发烧，后来就没事了。我们负责打扫房间，我一开始觉得，自己从小娇生惯养，从没有摸过笤帚，有一位老年人下床教我怎么干。到后来我学会了扫地，还学会了熟练地使用纸绷带。当时我们只有这个。有时我们会拿到些没有整理过的药。记得我们拿到过一些钙片。我的堂姐给了我几把钙片，希望有了这些药片我会好起来，因为当时我在发烧，还有别的毛病，很痛苦。医院的条件比外边好一些。我们这些在医院工作的人两个人睡一张单人床，而不是7个人睡一张双人床，这可是好多了。我们不用害怕点名，这不仅仅是我们不用凌晨三点钟起床，而且不用担心被

单叫出去，不会惶惶不可终日。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要不是我堂姐把我留在医院里，我连第一轮都逃不过去。



安娜·海尔曼(née Wajcblum)于1928年12月1日出生于波兰华沙。她有两个姐姐，分别是萨比娜和埃丝特。她们在一个传统的、被同化的犹太家庭长大。安娜的父亲雅格布 Wajcblum开办一个波兰手工艺品工厂，母亲丽贝卡 Wajcblum是家庭主妇。安娜在一所天主教公立学校上学。

1939年，在德国对华沙发起的空袭中，他们的房屋遭到轰炸，安娜和她的母亲差点丧命。安娜的姐姐萨比娜和未婚夫在德国人占领这座城市之前就逃到了波兰东部。其他家庭成员在1940年被关进华沙犹太人区。安娜秘密地加入了青年卫士会议，为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反抗团体（Z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张贴海报。在目睹1943年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之后，安娜与父母和埃丝特被遣送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两姐妹在那里与父母分开。

1943年9月，安娜和埃丝特被转到奥斯威辛比克瑙死亡营。她们被派到Weichsel Union Werke军工厂工作，她们从那里偷运火药，协助集中营负责处理死者的特遣队起义。埃丝特和其他三名妇女——罗扎·罗博陶、埃勒·加特纳、雷吉娜·扎佩尔施泰因——因参与起义于1945年1月被公开处决。同月，安娜被转到位于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诺伊施塔特-格莱沃集中营。



安娜·海尔曼（左）与姐姐萨比娜（中）和埃丝特（右）。

苏联和英国部队将安娜从诺伊施塔特-格莱沃集中营解救出来。她移民比利时布鲁塞尔，并在那里生活了一年。1947年，安娜移民巴勒斯坦，并与姐姐萨比娜团聚。她与约瑟夫·海尔曼结婚，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生下两个女儿。一家人在1958年移民美国，两年后又移民加拿大，安娜在那里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安娜和约瑟夫有四个外孙子。

证 词

安娜·海尔曼

我常把两个盒子带到我姐姐那里。她把一点儿火药包在一小块破布里，用线系好，然后在上边的盒子里放些垃圾。我带着两个盒子从我那儿走到她那儿，然后再回到我那儿，把东西放在桌子底下，放在袖口，因为衣服没有口袋。我从那儿去厕所，在厕所把东西分给另一个女孩埃拉。工厂距离我们住的比克瑙差不多三公里，我们把东西带在身上。有时候会遇到搜查。听到有搜查，我们就把火药打开，扔到地上，用脚搅和一下，就看不出了。[要是没有搜查呢？]那我就把东西带到比克瑙，交给我姐姐。我姐姐把东西直接交给罗扎·罗博陶，或者别的什么人，由谁再转给罗扎·罗博陶，那我不清楚了。[罗扎·罗博陶又把东西交给谁了呢？]东西到了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罗扎·罗博陶跟火葬场的一个人联系。他们可以进入女营，他们就是从女营把东西取走，带到火葬场。1944年10月，火葬场发生了一起暴动。在火葬场工作的人在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不时

听说为了灭口，他们会被杀死。这些人决定起来反抗。他们用偷运进来的火药造了小手榴弹，用装鞋油的圆金属盒，再装上导火线和火药，点燃以后就会爆炸。我不知道那东西造成了多大损害，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损害。暴动发生在1944年10月7日。暴动失败了，可能是泄密了什么的。火葬场工人全被杀了，火葬场也被毁了。比克瑙有四个火葬场，在那次暴动中毁掉了一个。那次暴动后，德国人找到了那些小手榴弹，而且确定了火药的出处。我们当然不知道，火药是有些特别的特征的。他们确定那种火药只会来自我姐姐工作所在的普尔维利。他们开始进行调查，后来把四个女孩关了起来：罗扎·罗博陶、埃勒·加特纳、雷吉娜·扎佩尔施泰因和埃斯特·瓦伊布鲁姆。她们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最后在1945年1月5日被公开绞死。



阿妮塔·拉斯卡-瓦尔费却(née Lasker)于1925年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她的父亲阿尔方斯·拉斯卡是一位律师，母亲埃迪塔·拉斯卡(出生时名叫埃迪塔·汉布格尔)是一位小提琴家。阿妮塔和两个姐姐玛丽安娜和雷娜塔成长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不墨守成规的犹太家庭，音乐在家庭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阿妮塔演奏大提琴，两个姐姐分别演奏钢琴和小提琴。阿妮塔到柏林师从一位出色的大提琴家，但是在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发生之后很快返回了布雷斯劳。

1939年战争爆发之后，拉斯卡一家人的生活条件日渐困顿。阿妮塔的姐姐玛丽安娜逃往英国，她的父母被遣送出布雷斯劳，从此杳无音信。阿妮塔和雷娜塔被迫在纸厂劳动，因而逃过了被遣送的命运。她们在纸厂遇到了来自法国的战争囚犯，开始伪造证件。1942年，阿妮塔和她的姐姐试图利用伪造身份逃离德国，但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送往布雷斯劳的监狱。她们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了几个月。

1943年，阿妮塔和姐姐被遣送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她被选中在女子营地的管弦乐队演奏大提琴，乐队指挥是狱友阿尔玛·罗丝。管弦乐队为纳粹演奏音乐会，身为乐队的一名成员，阿妮塔得以逃过一劫。1944年10月，她被转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该集中营在1945年4月15日被英国军队解放。



阿妮塔·拉斯卡-瓦尔费却——解放后演奏大提琴。

解放之后，阿妮塔仍然留在贝尔森流离失所者营地，在那里担任英国军队的翻译员。1946年，阿妮塔和雷娜塔与姐姐玛丽安娜在联合王国团聚。阿妮塔后来在伦敦成为专业的大提琴家，与英国室内乐团共同演出，同时还表演独奏。阿妮塔与音乐家彼得·瓦尔费却结婚，两人育有一子拉斐尔，日后成为一位著名的大提琴家。

证 词

阿妮塔·拉斯卡-瓦尔费却

转眼间我就成了大提琴手。我被带到了音乐区。[请说一说音乐区的情况。它跟别的地方是分开的吗?]不是，它只是其中一个区——音乐区，第12号区。在那里我看到一群人拿着颇为独特的乐器。不能拿一个乐队的标准来看他们。他们拿的乐器有曼陀林、吉他，还有小提琴、手风琴什么的。现在有了大提琴这种基础乐器。他们等的就是这个。[大提琴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儿有一把大提琴。在此之前人们常问我那把提琴是从哪里来的。奇怪的是，我在那儿的时候，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回想起来，这把提琴的主人可能是腋下夹一把提琴，被带到东部去干活的。我的是说人们是带着乐器来的。有人来到你的家里说，我给你两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你选一样对你来说最为珍贵的东西。那可能是某人的提琴。那把提琴就在那儿了。她让我拉点儿什么。可我有差不

多两年没拉琴了。所以我要求她给我一点时间，看看我还能不能找着调。我给她拉了波契里尼协奏曲的慢板乐章。我试着拉了这首曲子，可不管我拉得多差，我都不会落选的。无论如何她都需要有个大提琴手。这样我就成了乐队的大提琴手，我想我就是靠这个活了下来。[阿尔玛·罗丝是谁？]阿尔玛·罗丝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人能活下来，而且彼此保持联系，都多亏了她。她是阿诺德·罗丝的女儿。阿诺德·罗丝是维也纳交响乐团的负责人，一位非常有名的弦乐四重奏——玫瑰四重奏的成员。她还是古斯塔夫·马勒的外甥女，我是说她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她本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小提琴手。更要紧的是，她有很强、很强的个性。她很受我们的尊敬，我们都敬畏她。党卫军也敬她三分。她是威严的化身。

延伸阅读

Baer, Elizabeth R. 和Goldenberg, Myrna编著。《经历与表述：女性、纳粹和大屠杀》。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年。

Baumel, Judith T. Double Jeopardy: 《两性与大屠杀》。伦敦：Valentine Mitchell出版社，1998年。

Bock, Gisela。《欧洲历史中的女性》。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2年。

Bridenthal, Renate、Atina Grossman和Marion Kaplan等编著。《当生物学现象变成一种宿命：魏玛和纳粹德国中的女性》。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4年。

Fuchs, Esther编著。《女性和大屠杀：叙事与陈述》。纽约：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Heinemann, Marlene E。《两性宿命：女性作家与大屠杀》。纽约：格林伍德出版集团，1986年。

Hertzog, Dagmar编著。《残酷与欲望：20世纪欧洲战争与性别》。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9年。

Inbar, Yehudit编著。《亮点：大屠杀中的妇女》。耶路撒冷：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出版物，2007年。

Kaplan, Marion A。《尊严与绝望之间：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生活》。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98年。

Koonz, Claudia。《生活在祖国的母亲们：妇女、家庭和纳粹政治》。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7年。

Kremer, S. Lillian。《女性的大屠杀著作：记忆和想象》。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9年。

Ofer, Dalia和Weitzman, Lenore J. 编著。《大屠杀中的女性》。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

Rittner, Carol和Roth, John K. 编著。《不同的声音：女性和大屠杀》。圣保罗：Paragon House出版社，1993年。



联合国大会关于纪念大屠杀的第60/7号决议呼吁，就“大屠杀与联合国”这个主题制订宣传方案以及采取措施动员民间社会开展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自2006年1月新闻部制定“大屠杀与联合国”宣传方案以来，该方案建立了由民间社会团体组成的国际网络，制定了一个多面方案，其中包括：针对教育者的在线创新教育产品、社交媒体活动、学生视频会议、《讨论论文杂志》、数字视盘(DVD)、研讨会和培训方案、电影系列、签

书活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永久性展览，以及世界范围内每年一次的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活动。

大屠杀方案与大屠杀幸存者密切合作，确保人们聆听并关注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以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歧视造成的后果为戒。它还通过教育活动和宣传资料，继续与否认大屠杀的行为做斗争。在大屠杀方案所有的活动中，该方案总结出引起灭绝种族行为各种原因之间的联系，从大屠杀中汲取的教训，以及在当下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送邮件至holocaustremembrance@un.org，或登陆www.un.org/holocaustremembrance



纳粹浩劫基金会南加州大学视觉历史和宣教研究所收集并保存了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及灭绝种族行为的其他证据。纳粹浩劫基金会研究所收录了近52 000份音像证词（来自58个国家，使用34种语言），目的是开展研究和教育活动，通过利用研究所的影像证词进行教育，以克服偏见、不容忍和顽固——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痛苦。

www.usc.edu/vhi

FOR VISUAL HISTORY
AND EDUCATION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致力于大屠杀的纪念、研究、记录和教育活动，通过档案、图书馆、学校、博物馆，以及认定“国际义人”，将大屠杀遗留的历史代代相传。大屠杀纪念馆以史为鉴，旨在保护基本的人类价值

观，加强对延续犹太民族的承诺。www.yadvashem.org

妇女与大屠杀： 勇气和同情心

学习指南

“大屠杀与联合国宣传方案”与纳粹浩劫基金会南加州大学视觉历史和宣教研究所及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共同合作，为高中生制作了学习指南和数字视盘(DVD)，使他们更好地了解大屠杀对妇女造成的影响。妇女被迫适应并探索能够帮助其家人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幸存的方法。学习指南的每一章都介绍了各种情况，以及勇敢仁慈的妇女努力生存的方法。她们用自己的决心、领导、怜悯、奉献和毅力，养活家人，帮助维持集体感和宗教传统，并且以尊严和勇气面对纳粹的迫害。

配套数字视盘(DVD)记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屠杀幸存者，与大家交流她们的人生经历，她们是：埃丝特·贝姆、安娜·海尔曼、阿格尼丝·库恩、阿妮塔·拉斯卡-瓦尔费却、尤利娅·伦蒂尼和弗拉德卡·梅德。这些幸存者的证词和自传收录在学习指南中。本项目还可在线阅读www.un.org/holocaustremembrance。

